

淮陰史資料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淮阴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編

淮 阴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贝聿龄教授力同志
留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淮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研究会

前 言

在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前夕，我们编定了《淮阴文史资料》第二辑。这是献给我们伟大祖国的一点微薄的也是虔诚的礼物。

去年，第四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提出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根本方针。把这个方针扎扎实实地贯彻到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实际中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它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部分，担负着征集近、现代史资料的任务；它要通过史料的征集、整理和出版，进一步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它既为历史研究、教学部门提供翔实的和必要的资料，也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比较丰富的“乡土教材”。

本着上述精神，在编印了《淮阴文史资料》第一辑之后，我们一方面广征博采，开辟稿源；一方面则对已经掌握的资料进行研究、整理和利用。第二辑的编辑出版的特点之一，是仍然侧重于按历史阶段反映我市重大事件和人物，并沿着系统化、专题化方向，继续进行着探索和尝试。

1984年7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太原会议曾经提出：“农民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要强调对这方面史料的征集。本辑重点编辑了反映民国时期农村封建土地制度和旧社会黄淮水患两组资

。它比较深刻地解剖了“地主家族”的典型，纪录了水灾给淮阴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内容相当丰富。通过这两组资料，把近代中国的地主社会及天灾人祸的具体状况，又形象地重现在纸上。它能帮助年轻的认识、年长的重温，旧社会的封建剥削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旧制度又是如何压得农民无法喘息、无法生活下去的，进一步认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爆发和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并从而深刻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这一伟大真理。

淮阴人民是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人民。本辑收编的《“五四”运动时期淮阴各界爱国运动》和《“五卅”运动在淮阴涟水等地》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关于辛亥革命的史料，继第一辑之后，这里又发了一组，介绍了陈兴之、江来甫、张大卓等烈士献身革命的史迹，和江琴荪先生青年时期参加辛亥革命军“敢死队”的片断。

本辑介绍了著名地理、历史学家张相文和文史学家张熙侯。他们都是在近现代史上对国家民族作过贡献，在学术上作出重要建树的人。为了纪念张熙侯先生，我们还附载了他的《泗口考》，这是根据他的亲属所提供的手稿改写的。

另外，我们还发表了《淮阴大事记》的第一部分（从戊戌到抗战前），希望能得到修正和补充的意见。对于诚恳地提出批评建议的同志，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为此，我们印了一则“来函照登”。我们希望关心地方文史的同志都能够不吝指教。

淮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4年9月12日

目 录

地理、历史学家张相文先生事略·····	张 晴(1)
文史学家张煦侯先生事略·····	戴 岳(12)

“五四”时期淮阴各界爱国运动·····	赵炳焘(18)
“五四”运动中的宿迁·····	蔡子循(26)
“五卅”运动在淮阴、涟水等地·····	晁 浚(31)

清江、宿迁两地发生“抢面”事件的前前后后 ·····	冰 涛(37)
宿迁小刀会始末·····	郑克明(42)

江来南烈士参加辛亥革命史迹·····	江琴荪(51)
从“陆小”到学生敢死队·····	江琴荪(59)
辛亥革命烈士张大卓事略·····	(66)

附：张大卓烈士诗

贾伯谊烈士传略·····	厉天桥(70)
陈兴之被害纪实·····	韩席筹 范石府(72)
记辛亥革命烈士颜承烈·····	陈达轩等(75)
郑俊彦接替马玉仁之经过及有关情况·····	江琴荪(79)

淮阴洪水灾害史略述·····	晁 浚(83)
沭阳水患话沧桑·····	项景熠(87)

解放前涟水一带的黄淮水患周 群(95)

民国时期涟水导淮工地拾零王乃扬(103)

黄河夺淮述略荀德麟(112)

封建地主阶级镇压农民的一个罪证(125)

“大爷”的画像

——地主徐叔扬是怎样剥削和

欺压农民的张景良(132)

淮东恶霸地主刘鼎来的土地是怎样来的?

.....侍问樵(138)

湖心寺——淮安农民的一座黑地狱侍问樵(152)

泗洪新行圩反动地主许书成也 原(167)

大地主程震泰的兴衰杨鹤高(174)

泗口考张煦侯(186)

西坝镇小史胡伯超(195)

淮阴大事记侍守民 马超骏(202)

来函照登(232)

地理、历史学家张相文先生事略

张 晴

我国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张相文先生，字蔚西，号沌谷，1866年生于江苏泗阳，1933年卒于北京。

他幼时家境贫寒，祖锡昌、父鸿疆均以种田为生。他七、八岁尚不能入学，只好常常站在村塾窗外听课。他记忆力极强，往往听一两遍即能背诵，日积月累便熟记了不少文章。一日，塾师令一学童背书。那学童不能背得，张相文不禁脱口成诵。塾师且惊且喜，问知不能入学的原因后，遂决定令其免费就读，并供给纸墨笔砚。家中农事繁忙时，仍不得不让他辍学回家干活。然张相文酷爱学习，从不懈怠。上学时，他专心致志，手不释卷；劳动时，他书本随身，得空便读。不数年，学业大进。二十一岁参加岁试，名列前茅。翌年科试又考取一等。以此名闻乡里，因受桃源（今泗阳）县教谕胡和梅先生之聘，执教于县城淮滨书院。当时，书院新建藏书楼，有书万余卷。张相文置身其间，潜心苦读，几达废寝忘食，由是，学识更加渊博。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张相文十分关心战局变化。他一期不漏地购买《万国公报》（当时在泗阳唯一可以从中得到战事的消息的报纸）。他还买得一幅“中国全图”，挂在书室墙上，时时根据报上所载消息，在地图上标出敌军行踪。他不断向学生和家人讲述战争情况。张相文就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指引下，开始留心地理的。

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政府接受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久，一场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开始。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候，张相文拜别父母，游学江南，到苏州等地教馆，并得以读到维新党人创办的《时务报》，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在“人人争言西学”的新风气影响下，张相文渴求获得新的知识。他常从上海购买许多书籍，特别是有关地理方面的。他又得到一幅“世界地图”，因而研究地理的兴趣愈浓，从科学中寻找救国途径的决心弥坚。通过不断自学钻研，张相文在地理学方面有了一定造诣。

1899年，张相文到上海进入南洋公学（交大前身）师范班深造，主攻历史、地理，同时兼教外院留学班的国文与地理等课（后专任该校教习）。南洋公学本是一所专门培养出国留学生的预备学校，又处革命浪潮高涨的上海，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爱国人士萃于校庠。张相文深受影响，与吴稚晖、钮惕生、胡雨人、

孟纯荪、刘厚生等交往甚厚，常在一起磋商交流，学术上得到不少教益，思想上受到很大启迪。

1901年，《初等地学教科书》、《中国本国地理教科书》出版。这是张相文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地理知识以及通过实践提炼出来的独到见解，编著的中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影响甚大。教科书这一名词自此始。印行总数后来达到二百万部以上。

南洋公学还聘有外国教员教授各种外语。张相文在课余时间跟日本教员栗永孝太郎、藤田丰八等学习日语。1901年，张相文从日文翻译了法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书名依日文译为《万法精理》，于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较严复译本《法意》的出版，至少要早两三年，是我国第一个中译本）。它适应了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要求，对于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建设有一定的贡献。

张相文在南洋公学任教期间，受革命思想熏陶，结识了章太炎、邹容等革命人物，经常为章太炎办的《苏报》撰文鼓吹革命。后又为蔡元培创办的《警钟报》（原名《俄事警闻小报》）担负筹款任务。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加入了同盟会。《警钟报》被清廷查封，蔡元培出走海外，张相文遂赴两广师范任教。

1906年夏，在淮阴，就江北高等学堂旧址创办江北师范。一年后，到天津，先后任北洋女子高等学校

教务长、校长。

1908年，出版《地文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自然地理书。此前，世界各国对自然地理的研究皆局限于无机自然界，大都只讲地表的陆、气、水三界。而张相文的《地文学》却别出蹊径，既包括有星界、陆界、气界、水界，又新增生物界一章，把有机自然界也纳入了自然地理的研究范畴，加强了地文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科学性，这在世界地理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它的另一个特点是结合实际，注重实用。张相文抱着“经世致用”的爱国之心，在本书中不仅以我国的实际情况作为例证进行讲析，而且还注意到实用方面，如防霜、避电、培植森林、改良土壤，均直接涉及到国计民生。在欧美，自然地理注意到实用方面只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而张相文却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注意到这个重要问题，并且敢于独树一帜。公开在教科书中力图贯彻，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胆识，反映了他先进的学术思想。

1909年，张相文约同白雅雨、陶懋立、韩怀礼、张伯苓、吴鼎昌、孙师郑等二十七人，发起创办我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该会于9月28日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有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副使袁希涛，北洋大学校长蔡儒楷等行政官员和知名人士，以及天津各校师生一百多

人。会上，一致选举张相文为会长、白雅雨为编辑部长。随后，即通过会章，举行讲演会，开展学术活动。不久，张相文又把当时的国学大师章炳麟、地理学家白眉初、地质学家卞荣光、水利学家武同举、历史学家陈垣，以及热爱地理学的教育界知名人士蔡元培等都团结在地学会里，组成了我国第一支研究地理学的队伍。以后又继续吸收了许多地理、地质方面的专家，如章鸿钊、姚明晖、丁文江、翁文灏、徐炳昶、袁复礼、王成祖、殷祖英、张印堂、黄国璋、刘玉峰、蔡源明等，使得这支队伍不断壮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萌芽状态的现代地理学的迅速发展。

中国地学会的活动主要有两个：集会演讲；编辑出版会刊《地学杂志》。张相文为学会筹措经费、安排活动、编印刊物，付出了一腔热血和几乎全部精力。

辛亥革命期间，张相文与同盟会会员白雅雨（教师、地学会成员）等秘密结社，组织天津共和会，团结革命人士和进步学生，响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号召，筹划了著名的滦州起义。白雅雨赴滦主事，张相文南下请援。然而由于事不机密，起义失败，白雅雨殉难，张相文处理完白的后事，即辞去北洋女高校长职务，到北京专办中国地学会，并潜心研究地理学。

张相文研究地理，除了向书本学习外，很重视实地考察。他领导制订的《中国地学会简章》即明确规

定，会员“皆有调查之责任。如关系重要，或有所发明者，由评议员公议，赠以相当之报酬”。他自己曾跋山涉水到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内蒙古各地，到长城及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写出数十篇地理专著。重要的有《论导淮不宜全淮入江》、《导淮一夕谈》、《河套与治河之关系》、《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长城考》、《与章太炎论山脉书》等。由于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所以他的著作观点明确、论据充足、说服力强；在水土保持、风沙防治、土壤改良、气候观测、淮河疏导、黄河治理、河套开发、水陆交通、树木栽培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张相文是淮河流域人，曾多次到淮河流域进行实地考察，对淮河水系情况有较深的了解，因而能在治淮问题上力排众议，提出了“分流以入江海”，即“二分入江，八分入海”的重大建议。《地学杂志》1912年2月号还发表了根据他的论点绘制的“拟定淮水新道图”。然而，当政者对他的宝贵意见却置之不理，仍坚持循故道导淮，以致产生了许多本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恶果。

张相文对于黄河的治理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在河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后，又研究了历史上的治黄方案，提出了从上游着手、在河套分黄水灌溉的方

案，主张在黄河、海河上游造闸、造湖、造林，以利蓄水灌溉、改良土壤、调节气候。他不仅这样想，而且力行之。1914年，从河套考察回京后，他即与张謇等筹划开垦河套事务，决定各投资大洋两千元组织“西通垦牧公司”。他用了一年多时间亲自勘察规划，拟先开河套荒地，再垦河西走廊。他们艰苦奋斗六年，在五原县乌兰脑包建房二十余间，垦地十万八千亩，饲养牛羊上千头。然而，官绅兵匪竞相掠夺，没收了他们开凿的河渠，抢走了他们饲养的牲畜，甚至对他们的农垦用水进行敲诈勒索。于是，西通垦牧公司只得宣告解体。

民国元年（1912年），张相文被选为国会议员。1913年4月，民国第一次国会在北京开幕，立宪派张謇、汤化龙、梁启超等支持袁世凯专制独裁。张相文拒绝张謇的拉拢，毅然加入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不久，国民党在南京发动“二次革命”武装讨袁。袁军张勋部攻陷南京，杀掠三日，血流遍地。张相文满怀悲愤书七绝一首：“秦淮呜咽血流腥，瓦砾丛中鬼夜鸣。好凿钟山镌纪念，袁军三日洗南京。”以记其事。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了有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并对张相文多方施加压力，企图迫张就范。然而张相文并没有被吓倒。1914年5月，袁世凯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换得日本支持其

称帝。张相文怒不可遏，立即赋诗公开揭露袁的卖国行径。诗云：“窃国从来胜窃钩，山河容易掷金瓯。内家争羨儿皇帝，价重燕云十六州。”1915年8月，复辟帝制的御用团体“筹安会”成立。发起人中有张相文的“旧同志”、老同盟会员孙毓筠。孙拉张入会，遭到严词拒绝。在拉拢、威胁均无效果的情况下，袁世凯决定对张相文严加惩处。张相文的住宅周围布满兵警和便衣侦探，他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为了避开密探耳目，张相文将须发染黑，头戴斗笠、身着破衣，化装成一个逃荒者，于1916年4月出了家门。他雇一毛驴出永定门到丰台乘火车经天津抵达上海，住在“青年会”，假名张半仙，以卖卜度日，并继续联络旧日同志商谈国事，共谋讨袁。

1916年6月，袁世凯帝梦破灭遗臭而死。他所建立的北洋军阀集团立即分化，不断发生混战。段执政利用张勋复辟，逼走黎元洪，取消《临时约法》。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开展“护法运动”。张相文回到北京后又曾两次南下，参加护法。1923年，曹锟贿选，威逼利诱在京国会议员。张相文刚正不阿，拒绝诱逼，先在西山避居月余，遂又远走上海，再次表现了他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风亮节。

民国成立后，黄兴等九十七人曾呈请设立国史馆以编纂民国史，未果。1917年6月，北洋政府决定将

编史工作交给北京大学，在文科中国史学门中附设一个国史编纂处，由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兼任处长，下设纂辑和征集两个股，聘请一批著名教授、学者担任纂辑员，编纂民国史和民国以前的我国通史。当时张相文正在北大任文本科教授，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其子张星烺教授也正在北大讲授《中西交通史》，父子二人同时受聘为国史编纂员。张相文与邓之诚负责编纂民国史。在一次研究征集工作的会议上，张相文提出：“民国史料，以人民为主，宜由个人及公共团体或直接或间接广为征集，方得个中底蕴。”这种以人民为主、依靠人民征集史料的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非常正确的。他先以国史编纂处的名义备了公函，向北洋政府国务院和全国各省政府机关索取出版的政府公报；又以蔡元培名义，在各机关中聘请一些熟悉掌故和主管文牒的人员为名誉纂辑员、名誉调查员，请他们给国史编纂处提供有关资料。1918年6月，张相文进而明确提出“众擎易举”的主张，并在北京大学内创设了“征集会”，发动北大学生参加收集史料的工作。这一主张刚提出，三天内就有二十六名学生报名参加（冯友兰先生当年也在其中）。不到半年，征集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据1919年3月国史征集股的报告，即各种书报抄件已收集七百八十种、五千五百六十册。这个发动群众征集史料的成功

经验，经蔡元培大力推广后，效果更为显著。

在国史编纂处工作期间，张相文十分刻苦，他负责撰写民国大事记，任职不及一年，撰写的辛亥一年大事记已有三十二册。他还编写了《辛亥前革命运动纪事》一书，撰写了《邹容传》、《徐锡麟传》、《赵声传》、《黄花岗烈士传》等数十篇辛亥革命烈士和民初人物传记，也撰写了《袁世凯轶事》、《解散国民党纪事》、《帝贼谱》等，揭露袁世凯等人卖国求荣、复辟称帝的丑恶行径。原拟和蔡元培一起再编写一本《国史前编》，着重记录清末各秘密党会的成立和活动简史以及它们与革命的关系。以此，曾两次与蔡元培联名写信给孙中山请求支持。孙中山复信以为清末秘密党会只有“覆清扶明”的民族主义思想，而不懂共和民权主义，“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不赞成编在民国史中，建议另编秘密会史。（见1919年1月14日孙中山致蔡、张的复信）于是，计划未得实现。

在编史过程中，张相文十分尊重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为官僚政客捧场，不为亲朋好友饰非。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民国刚成立七、八年，很多要人不仅依然在世、而且权重一时，一旦触怒他们就可能危及身家性命。张相文为了忠于历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在《金珠传》中记载了一位当时在北洋政府颇有地位的人物。此人与张相文在青年时代

就有交往，相处不错，但后来投靠了袁世凯，做出对革命对人民不利的事。张相文毫不掩饰地记录了此人的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玉章同志读了张相文的这些作品后，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记载翔实，观点正确，是一部信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洋政府对运动的中央北京大学深怀戒心，遂借口“国史有关制作，仅由学校附设机关，不足以昭郑重”，匆忙将国史编纂处收归国务院。不久，张相文辞职，于1920年回到家乡泗阳，主持编修《泗阳县志》。三年后，又应江苏省政府邀请，担任江苏省通志局编纂，负责水利、宗教二门。次年孟夏，因病去沪，仍带病坚持工作；入冬，便将所编《江苏通志》稿五十八册计五十余万字寄至省政府。此时，张相文已年逾花甲，健康状况不佳，但他忧国伤时之心犹烈，每天仍坚持著作。

张相文是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坚持正义，维护革命精神，不畏权势，敢于直言；他以毕生精力从事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为发展中国现代地理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研究历史、编纂史志方面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83年1月，首都和天津地学界和史学界隆重集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张相文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给予张相文以很高的评价，并且展出了他的有关资料和著作。